



赵树理小说

的改编与传播

段文昌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赵树理小说

的改编与传播

段文昌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树理小说的改编与传播 / 段文昌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203-08880-6

I. ①赵… II. ①段… III. ①赵树理(1906~1970)
—小说—文学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4789号

赵树理小说的改编与传播

著 者: 段文昌

责任编辑: 吕绘元

装帧设计: 刘彦杰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ccb@163.com 发行部

sxsc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c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厂: 晋城市景潮办公用品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21千字

印 数: 1-1200册

版 次: 2014年12月 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8880-6

定 价: 2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文学的生命与历史的记录(序一)

赵魁元

研究赵树理文学,一般从文本分析着手,或者以不同历史时期作品的命运(生与死、热与冷)着手。当然,国外的研究者则以译本为基础着手,尽管译文受语言、文化、社会差异影响,译作同原著相比并不一致,有时甚至面目全非。从赵树理作品的改编着手研究的似乎不多,把改编和传播联系起来研究的更为少见。现在,这样的研究有了,不仅仅是几篇论文,而是学术性的专著,是一本书。这就是即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赵树理小说的改编与传播》,作者为段文昌。

《赵树理小说的改编与传播》是晋城市赵树理研究会确立的研究课题,而课题的提出者和承担者就是段文昌: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生于晋城、长于晋城的本土学者。按要求,时间三年,课题成果要成书出版。所以,对这本书的来龙去脉我比较清楚,通过对赵树理研究的十几年接触,对段文昌也是比较了解的,对他能不能承担,能不能比较好地完成这一课题还是有疑虑的。今年年初,段文昌完成了第一稿,送我看后,我着实吃了一惊。资料的翔实、系统和全面,论点的有理有据,研究成果的厚重,我一直悬着的心放下了。初稿是成功的,但还略显粗糙;论点、论据是站得住脚的,但还需要理论上的再提炼。说心里话,对赵树理的研究,地方学者有热情,有责任,但由于视野的不开阔,收集和查找资料的困难,理论素养的不足,总是局限了学术研究的深度和高度。所以,晋城市赵树理研究会对初稿进行了专题研讨,又请了几位知名学者帮助审稿。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

基础上,作者反复进行了修改,可以说几易其稿。应该说,课题的研究达到了甚至超过了预期的目标。该书不仅为赵树理研究拓宽了路子,是近年来赵树理研究的新成果之一,更为学者、专家研究赵树理,为广大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了解赵树理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参考书。所以,该书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之所以说是赵树理研究的新成果,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

一、历史的真实记录:赵树理作品是什么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问题太简单了,赵树理早已被定位于“人民作家”、“方向性作家”、一生为农民写作的“铁笔圣手”,《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名著。历史确实如此。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乃至遗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语境中,赵树理成了“被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赵树理更是难逃厄运,代表延安文艺讲话方向的作家,却被诬蔑为反对延安文艺讲话的作家,直至被迫害致死。大家悲愤至极,但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一个颠倒黑白的时期。拨乱反正之后,党中央正式为赵树理评反,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追悼会,很快在全国掀起了研究赵树理的热潮。但没过多久,一些人企图全盘否定延安文艺讲话,又把赵树理和延安文艺讲话捆在一起否定。赵树理的形象模糊了,不清楚了。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总认为赵树理过时了。赵树理文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成了历史的困惑。

那就好好读读这本书吧。

《小二黑结婚》既是赵树理的成名作,也是一部经典作品,其改编也可谓是赵树理作品改编的代表。“小说还未正式出版之前,1943年7月,根据手抄本,《小二黑结婚》就被改编成襄垣秧歌而被搬上舞台”,接着,太行、太岳解放区的“许多剧团纷纷改编演出,有上党梆子、武安落子、中路梆子、沁源秧歌、武安秧歌、小花戏、蒲剧……”犹如文化战线的“百团大战”,百团齐唱

《小二黑结婚》，真正的百花齐放。

截至“文化大革命”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总共有两千多个乡、县、地、省及国家级剧团，以三十多种形式把《小二黑结婚》搬上舞台。特别是歌剧《小二黑结婚》从1952年成功演出以来，已成为继《白毛女》之后的中国又一经典歌剧。从农村到城市、从地方小剧场到国家大剧院、从群众性娱乐演出到文化部组织的中国首届歌剧节，歌剧《小二黑结婚》长演不衰。2011年11月，山西省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师生排演的实践教学剧目——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代表山西省参加文化部在福州举办的首届中国歌剧节，一举夺得集体演出奖、编剧特别荣誉奖、作曲特别荣誉奖、优秀导演奖、优秀表演奖等七个大奖。2012年4月5日在国家大剧院、6日至8日在天桥剧场，又连演四场。

——这是为什么？许多经典作家在谈到自己作品的生命力时常说的一句话：五十年后看。今天，距小说《小二黑结婚》发表已七十多年了，答案只有一个：《小二黑结婚》的无限生命力。赵树理其他作品的不断改编，同样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阅读着这本书的一页页，仿佛走进了历史的画廊：赵树理笔下的一个个故事，一个个鲜活、生动有趣的人物正向我们走来。

二、一个家族的孩子：同中有异，相得益彰

原著和改编作品是什么关系？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一个是原著，一个是改编，不过形式不同而已。改编时要尊重原著，要搞好二度创作，似乎大家都知道。特别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改编成电影、电视剧，金庸武侠小说被反复改编为影视作品，似乎使国人在议论原著和作品的改编上，人人都能说出个一二三。但真要说个一二三，似乎并不简单。

为了研究的方便，作者首先从一般意义上论述了改编的含义、性质、方法，用大量中外改编成功的作品为什么成功，说明了改编作品与原著的关系。这对于全书的阅读，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并从一般到个别，引出了赵树理的改编观。为了充分说明这一点，作者细心地、深入地分析了每一

部被改编成不同形式的赵树理作品。作者坚持运用文本分析和比较研究两种基本方法,从创作主题、剧情结构、人物设置、时代语境、改编目的,令人信服地告诉了我们原著和改编作品的关系。

书中最有趣也最有代表性的章节,我觉得首数贺友直多次创作连环画《小二黑结婚》的一节。四次较有影响的创作分别是1959年版、1980年版、1996年版、2010年版。时间间隔五十一年,半个多世纪。历史发展之快,时代语境变化之大,贺友直为什么坚持不懈地创作《小二黑结婚》呢?坚持,意味着《小二黑结婚》的生命力,意味着贺友直对《小二黑结婚》的认识和喜欢始终没有变。反复创作,则意味着贺友直心目中的《小二黑结婚》也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特别是1996年版,距第一版已三十多载,社会环境巨变。“贺友直尽显幽默天赋,以中国写意画的表现形式,采轻透墨色,达至喜剧感。这套连环画用笔不求功细,重在传神写意,充实了很多原来文字中没有的细节。”即使对三仙姑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半百婆姨赛新人,仙姑事儿有名声,男女老少争相看,神仙也怕难为情”。已不是全然的否定,三仙姑已成为十分有趣的形象,引人深思。2010年版,则更为有趣,是八十九岁老人为了给爱孙新婚贺礼而创作的,这真是文学作品改编的佳话。

贺友直为什么对《小二黑结婚》情有独钟,请听听贺友直是怎么说的:“我敬重赵树理,我欣赏他写的小说。我喜欢他笔下刻画的人物……二诸葛、三仙姑这样的人,不只是山西农村有,在别的地方,我猜想也会有……塑造这种有趣的现象,描绘这种人物做出的‘有趣’的事,不是取笑,不是挖苦,不是糟蹋,而是作为一面生活的镜子,可以让人见了能在会心的一笑中,发现自己也存在这类‘有趣’的行为。作家、画家的创作目的,就在于此。”“我喜欢幽默,我的性格里有幽默的成分,或者说,与赵树理式的幽默有相通之处。我认为,创作激情,其基础当然是体验和认识,但诱因则是兴趣,没有兴趣,就难以产生灵感,没有灵感,又怎来艺术。所以基础和兴趣,是二者不可缺一的。”真是一语中的,不仅道出了贺友直创作灵感和激情的

真谛,也生动地阐明了赵树理创作灵感和激情的真谛。

历史的教训是,对赵树理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后的肯定、肯定之后的再否定这一“赵树理现象”。我们过去往往过多地从政治语境去解读赵树理,而忽略了艺术的解读。有的人根本不了解赵树理,却在解读赵树理,这真是可悲。

小说《小二黑结婚》与贺友直的连环画珠连璧合,贺友直对原著的理解及反复创作的表述,应该成为研究原著与改编作品关系的经典。深究下去,还会挖出许多的成果。

赵树理小说被改编为各种戏剧,并留下了许多故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赵树理作品中含有丰富的戏剧元素。这也是有些剧种仍在不断改编赵树理小说的原因。这在赵树理研究中已成共识,书中也有大量叙述。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仍没有一本研究赵树理与戏剧的专著。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也是本书的一个贡献。

原著与改编作品的关系,我忽然想到,不就是一个大家族的孩子吗?同一种形式的改编,同一剧种对不同作品的改编,同一作者对不同作品的改编,不就是一个家庭吗?只不过,原著是长子,其他都是小弟弟。不过有的小弟弟可能更活泼而令人喜欢。特别是现代传媒的发达,对原著传播速度之快、传播效果之大,更是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的。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了八个字:“同中有异,相得益彰。”

三、赵树理的传播理念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启示和影响

赵树理的创作理念是非常清晰的,走大众化道路,为农民写,让老百姓喜欢看。同样,按照现代创作理念,为理想读者写。在赵树理所处的时代,赵树理的理想读者应该是最多的。不仅如此,怎样让农民喜欢看,也是赵树理常常思考的大问题。过去大家关注赵树理创作的一个是语言,让识字的人看得懂,让不识字的人听得懂,所以赵树理在语言上下了功夫,既通俗又不囫囵吞枣地套用地地方言,所以被称为语言大师。一个是形式简短、

明了,没有多余的话,正如日本学者竹内好所言,加一字显得多余,去一字显得不足。接受过西方文学和五四文学影响,也会用西方文学写作方法写作的赵树理,为了老百姓,毅然放弃了或简略了风景的描写和心理活动的挖掘,创造了独特的风景(地理)和心理描写。这也是有的人不承认赵树理作品是优秀文学的原因之一。赵树理全然不理睬这一点,而是在节约出版成本,降低书价,怎么让老百姓买得起上下功夫。现代文学的传播到了今天,特别是现代传媒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传播已发展成为传播学,成为一门显学。可喜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原著和改编关系的探究上,同样把视野延伸到文学作品的传播上,把赵树理小说改编和传播放在一起研究,同样为赵树理研究增添了鲜活的内容。

第一,赵树理是有意识地关注作品传播,并努力实践和探索作品如何传播的经典作家,因此也可以说是中国传播学的先驱者之一。正如著名学者、北师大教授赵勇(非常可喜的是,他是晋城人)指出的那样,“文艺的传播和接受问题,应该说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大众化、民族化的争论中便已被提上议事日程”。“赵树理便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逐渐孕育、形成他的传播思想的。不过,在进入赵树理传播思想的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同时代的作家中,为什么唯有赵树理对文艺的传播思想最为敏感?为什么只有他才自觉自愿地把理论体现到了自己的写作实践中而极力想疏通他所设想的那条传播路线呢?”赵勇详细分析了原因。用几个关键词来说明就是:抗日战争、宣传、新闻、文艺。用一句话来形容则是时代的需要:“为抗日救亡鼓与呼。”

第二,回到问题的原点:你为谁写作?首先引用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2008年5月24日在北京大学演讲时的一段话:“你为谁写作?自从成为作家之后,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这是读者和记者向我提得最多的问题。”“作家为谁写作呢?——我们不妨说他们在为理想的读者,为他们亲爱的人,为他们自己写作,或者不为任何人而写作。这是真的,但并不是完全的真理。因为当今的作家也在为阅读他们作品的人而写作。”

“世上没有一个理想的读者不会受到社会的禁律和国家神话的影响；同样，世上也没有理想的小说家。但是，不管他是国内还是国际作家，他们都在为理想的读者写作。首先，他们会想象有这么一个理想的读者；然后在创作时脑子里还时刻想着这个理想的读者。”赵树理不正是这样的优秀作家吗？他心目中不是想象的理想读者，而是现实的对象：亿万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的中国农民。赵树理视他们为最亲爱的人。赵树理不是为自己，不是为小我，而是为大我写作，终生奋斗而不悔，任凭风浪永不改。这正是赵树理的伟大之处。正在写这篇小文时，忽然传来了习近平总书记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消息。七十多年前，毛泽东主席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批准了赵树理的创作方向，赵树理更加自觉地坚持为人民而写作，终于成为代表解放区文艺创作方向的人民作家。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学艺术创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方向，这再次证明了赵树理创作方向的正确。赵树理作品是富有生命力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文学梦应该是最美丽的。文学艺术当然是多彩的、多样性的，但只有以人民为中心创作的文学作品，才是最光彩、最耀眼的。无论现代传媒如何发达、传播手段如何多样和先进，都必须以优秀的原著为基础。

该书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有它明显的不足之处。比如，《小二黑结婚》改编的成功，影响的深远，与同为经典作品的《李有才板话》改编作品少而形成反差，书中已有所涉及，但并没有深度解读和研究。又如《三里湾》改编为《花好月圆》，作者下了很大功夫。当时，赵树理在肯定改编成功的同时，还留下了几次极为珍贵的谈话。现在的研究，作者仍停留在赵树理研究的原有成果，特别是固化于姓社和姓资的两条道路之争、两条路线之争的局限。这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作者，这同样是赵树理研究的缺陷。赵树理与农业合作化的关系，目前研究的深度、力度不够，更不够系统，《三里湾》应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还没有完全挖掘出来，因而为作者提供的素材也不够。我们寄希望于该书出版后广泛征求意见，吸收更多的研究成果，继续充实完善。

段文昌同志还有一个心愿,想把赵树理的翻译与传播作为一个课题研究下去。这当然是好事,但难度更大。因为涉及国外翻译与研究,光资料收集的难度就很大。当然希望段文昌能够坚持下去,也希望社会各个方面的支持。如能完成赵树理作品的翻译、改编与传播,当是赵树理研究之大幸,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幸,我们翘首以待。

2014年10月

(作者为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

在主文本与副文本之间寻寻觅觅(序二)

赵 勇

文昌兄把他的《赵树理小说的改编与传播》发送给我,让我为这部书稿提提意见。拜读之后,我有些想法,权且写到这里,算是我的一点读后感吧。

我虽然并非赵树理研究专家,但出于多年的兴趣与爱好,却也时常关注着赵树理研究界的动静。在我的印象中,20世纪90年代的赵树理研究是比较沉寂的,而进入21世纪以来,赵树理研究则渐趋升温: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开始重新打量赵树理,一些年轻的学人先后以赵树理为题撰写硕博论文,乃至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些学术期刊也舍得拿出版面,聚焦于此——在我刚刚收到的《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3期)中,就有一个赵树理研究小辑,那里收录了五篇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些事实表明,赵树理正在成为一个“说不尽”的人物,他穿过历史的风沙,向我们迤逦而来,仿佛在检测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向度和研究高度。

把文昌兄的这部书稿置于这一研究语境中,我首先意识到的是它的别具一格。就我目力所及,如今做赵树理研究者,要不依然从其文本内部出发去释放意义,要不就是让他在与另外一些作家(如丁玲、孙犁甚至沈从文、汪曾祺等)的比较中去发现其价值,而把目光对准赵树理小说的改编与传播进而大做文章,这种情况似极为少见。按照我的理解,赵树理的小说为主文本,也是诉诸于听觉系统的文本(众所周知,这种特点与赵树理的自觉追求有关),而那些被改编的作品一方面是副文本或亚文本,另一方面,无论是连环画、年画还是戏剧、电影,它们无疑都在追求一种视觉化的效

果,或者说它们把视与听糅合到一起了。因此,研究赵树理小说的改编与传播,实际上就是研究主文本与副文本之间的关系,或者也可以说是研究听觉文化与视觉文化之间的关系。

段文昌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自己的分析的。于是我们看到,凡是被改编过的赵树理小说——像《小二黑结婚》《登记》《三里湾》《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传家宝》《小经理》《邪不压正》《福贵》《套不住的手》等——作者都把它们拎出来,进而在主文本与副文本之间寻寻觅觅。也正是通过作者的梳理、比较和分析,我们才知道有那么多的副文本参与了对主文本的再生产过程。以《小二黑结婚》为例,小说还未正式出版之前,它就被改编成襄垣秧歌而被搬上舞台。小说出版之后,更是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改编高潮:先是在山西境内的改编——上党梆子、武安落子、中路梆子、沁源秧歌、襄垣秧歌、武乡秧歌、小花戏、蒲剧等,其后又是在全国各地的改编——歌剧、话剧、评剧、豫剧、山东快书、弹词、电影等。据不完全统计,截至“文化大革命”,总共有两千多个乡、县、地、省及国家级剧团用三十多个剧种把《小二黑结婚》搬上了舞台。

这种改编盛况让我很是感慨,我能联想到的方面,一是今天的许多小说固然也在被改编着,但这种改编基本上已局限于电影、电视剧,它们似乎再也享受不到被如此全方位改编的待遇了。而在这种待遇的背后,我们似可发现彼时改编的诸多秘密。例如,改编不仅是为了更形象地讲述一个故事,而且更在于它能否转换成一种说唱艺术。而受到地方戏曲影响的小说最终又变成了地方戏曲,这似乎也把赵树理那种“说说唱唱”的理想落到了实处。二是套用麦克卢汉的说法,我们可以把小说这种形式看作“冷媒介”,而把戏剧、电影等形式看成那种“热媒介”。“热媒介”为了增加故事情节的“清晰度”,自然不可能不对原著增、删、调、改。这也意味着仅从技术层面考虑,赵树理小说被改编的过程也是不断“调焦”、“实焦”的过程。三是与此同时,改编作为一种文学再生产活动,虽然会顾及到原作,但更主要的还是要服从改编者的意图。而在那个年代,由于改编者不可能有多大的自主空间,所以改编者的意图很大程度上体现的也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意

图。因此,特别关注改编中被政治意识形态动过手脚的部分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那是我们破译改编密码的起点。四是受众通过改编固然熟悉了那个故事,但许多人心目中的《小二黑结婚》却并不相同,因为那些剧种、唱腔事先已让那个故事有了地方性。这就意味着面对改编本,受众首先是一种方言式接受(地方戏),然后才是定于一尊的普通话式接受(电影)。这种现象非常有趣,也颇值得玩味。

以上联想,有的是基于段文昌本人的思考,有的则是我个人的一些考虑。沿着作者的思路,我们看到他在对主文本与副文本进行比较时,特别指出了副文本的那些增删与改动之处,令人过目难忘。作者指出:小说《三里湾》和依此改编的电影《花好月圆》,主题方面,前者表现的是渐进而实际的路线斗争,后者呈现的则是纯粹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不可调和的敌我冲突。情节方面,前者主要写农村现实生活中新旧思想的斗争,电影则是以三对青年的恋爱作为主体。而拍成电影的《小二黑结婚》与原作相比,其命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影片一开始就立场鲜明地为故事确立了一个政治救赎的基本框架,把小二黑结婚的故事纳入到民族政治解放的时代主题中,将小说演绎成一出政治救赎下的现代婚姻传奇。为了完成这一创意,主创人员对小说进行了大胆改编”。在我看来,这正是文学再生产过程中被植入的新质,它们改变了原作那种朴素的诉求,也把赵树理的小说打造成了一种宏大的国家叙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有必要指出一个基本事实:虽然赵树理的小说本来就有“政治上起作用”的实用功能,但由于这种功能依然被小说的审美逻辑约束着、框范着,它还不至于剑拔弩张,而一旦打破这种平衡,即意味着审美意识形态转变成了政治意识形态。于是,那些改编本固然满足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但相对于主文本来讲,它们也确实已被打造成次文本了——那是低于原作的文本或仅能作为次品存在的文本。

然而,许多人接受的却恰恰是这种次文本。以笔者为例,我记得自己在未读《三里湾》之前便看过《花好月圆》这部电影了,观看的时间应该是1978年的某一天,而地点则在我们村大队部的露天场院里。三十多年之

后,我依然能想起这部电影的基调是喧闹或吵闹,而一边呈现针锋相对的斗争,一边表演紧锣密鼓的爱情,这种套路似乎又与我看过的《金光大道》《艳阳天》区别不大。如此感受在我的脑海中存留多年,甚至后来读小说时依然挥之不去。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种先入为主式的“占领”已形成了第一印象,要想把它清除到记忆之外已难乎其难。而即便我后来阅读小说,试图还原一个真正的《三里湾》,电影中的情景也仍然会有意无意地参与到小说意义的建构之中,我已无法完成较为纯粹的意义寻找了。由此推想那些只看过改编本的广大受众,他们印象中的《三里湾》或许与小说文本已相去甚远,但这就是赵树理的小说被改编之后有可能出现的传播效果。

由此看来,传播涉及编码与解码,也涉及受众与改编本之间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这部书稿在编码的层面用力颇深,值得肯定,但对解码似乎还关注不够,略显遗憾。假如能在这一层面再下些功夫,我以为就更加圆满了。当然,这样给作者出主意,我也意识到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解码问题要想从容展开,那得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而时过境迁之后,即便能找到观看赵树理小说改编本的受众,他们的记忆或许也早已模糊。所有这些,都给调查取证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文昌兄是我的老乡,又是我大学时同年级同专业的同学,他能写出这部书稿,我并不感到意外。在我的心目中,他一直都谦虚低调,同时又聪颖好学。我现在依然记得大学毕业我们同在上党古城混日子时,不时会相互走动,交换一些学界的信息。一旦发现我那里有什么新书,他也会借走先睹为快。他都借过哪些书我现在自然已不可能悉数想起,但路翎的《财主底女儿们》上下卷他肯定是借过读过的,因为那是我1985年夏天在水东供销社买到的小说。一个乡政府所在地的杂货店里居然会摆着这种书,现在想来依然觉得有几分神奇。

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昌兄随工作单位迁至晋城,从此他便在我们的老家安营扎寨了。我知道他原来就主攻中国现代文学,由此把赵树理作为他的研究对象自然就显得顺理成章。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赵树理曾经挥洒过汗水和才情也十分钟爱的那片土地上,他对赵树理

的理解也就更妥帖、更到位,更能入乎其内也更接“山药蛋”地气。前些日子,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还在跟我念叨:既然你研究过一阵子“西马”,为什么不把“西马”这架探照灯用起来呢?你东探探,西照照,或许就能照出一些东西来。比如,你们老家的赵树理你就可以照一下嘛。如今,面对文昌兄的这项研究成果,我在欣喜之余也好生羡慕,甚至都有点蠢蠢欲动了。受文昌兄启发,说不定我哪天也真的会重操旧业,打回老家去,研究赵树理。

2014年7月31日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导 论	1
一、改编的含义	1
二、改编的性质	3
三、改编对象与改编者	8
四、常见的改编方法	13
五、赵树理的改编观	17
第一章 《小二黑结婚》的改编与传播	22
一、小说的创作与发表	22
二、小说的改编与传播概况	24
三、具体改编本与小说原著之文本比较	25
第二章 《登记》的改编与传播	43
一、小说的创作与发表	43
二、小说的改编与传播概况	44
三、具体改编本与小说原著之文本比较	45
第三章 《三里湾》的改编与传播	55
一、小说的创作与发表	55